

新闻评论和新闻教育

News Commentary & Journalism Education

秦珪 著



新华出版社

新闻评论与新闻教育

秦珪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评论和新闻教育 / 秦珪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166-1524-9

I. ①新… II. ①秦… III. ①评论性新闻—研究②新闻学—教育研究

IV. 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0566 号

新闻评论和新闻教育

作 者: 秦 珪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刘 飞 崔晶茹

封面设计: 崔晶茹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a.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七彩京通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524-9

定 价: 3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序

方汉奇

秦珪兄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老革命，当我在政治上还浑浑噩噩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太原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1947年到北京念大学后不久，他又积极投入了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早在1952年就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他还长期协助过民主党派的工作。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翘楚。

秦珪兄又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他毕业于著名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称新闻学院）任教。他淹博多识，诲人不倦，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院系的八千子弟，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受教于他。当代中国的名记者如郭超人、艾丰、陈锡添等，都得到过他的亲炙。他传道授业解惑，名满天下，海内新闻业者，凡是在两校新闻系念过书的，或看过他编的教材的，未有不知清徐秦氏者。

秦珪兄在从教期间，主讲新闻评论方面的课程。课余的学术研究，也以这方面的开拓为主。收入这本书的，有关中国古代论说文和中国现当代各时期新闻评论的一系列分析评论文章，就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从他有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政论名家，唐宋八大家，明清和民初等各时期的政论名家作品的分析和评论中，可以看出他非常重视古近现代优秀政论家和政论精品的借鉴和传承，真正做到杜甫所说的“不薄今人爱古人”和“转益多师是汝师”。从他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时期报刊评论文章的评介和剖析，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当代评论写作经验和教训的分析和总结，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细致入微的剖析，

钩沉探赜，取精用宏，使青年学子知所遵循，得到很好的教益。

秦珪兄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教育的笃行者。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学方面工作的领导职务。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创办初期，他是这个专业主管教学工作的教研室秘书，是当时的专业负责人罗列的主要助手。人大停办、北大新闻专业恢复招生的那一段时期，他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教学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人大复校后他仍然长期担任教学方面的系院领导职务。从培养目标到教学计划的制定，从课程的设置到外聘讲课人员的联系和安排，从招生、实习到毕业生的分配，他都亲与其事，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是新中国新闻教育的行家里手。在这方面，他有很多的心得和体会。收入本书的不少文章，涉及新闻教育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有关本科培养目标的论述，有关新闻系学生应该根据专业的特点单独招生的论述，有关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改革的论述，有关加强校内教学的实践性环节的论述，以及强调新闻院系学生应该加强基础教育，重视社会实践，实行多层次、多种形式办学的论述等等，都贯穿了他对新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和心得体会。这些论述对今天的新闻教育的发展，将会起到很好的推动和借鉴的作用。

我和秦珪兄在北大和人大两校相识相知和共事逾六十年。深感他是一位襟怀豁达、宽厚朴挚的长者。他通权达变，与人为善。我在和他共处的过程中，曾经多次得到过他的帮助。“文革”中，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打了三年石头，是他在我回京探亲的时候，把我留下来给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们当教员的。“文革”后期，我的一些小小的研究成果写出来后无处可以发表的时候，是他以教研室的名义，打印出来，装订成册，分发给教师们参考的。拨乱反正以后，当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正在进行中的时候，是他介绍给山西人民出版社，拿去签约出版的。他的这些义举和善行，对当时已是涸辙之鱼的我说来，都无疑是雪中送炭，让我铭刻在心，永志不忘。

现在，他的这部专著即将出版。我乐观厥成，也乐于把它推荐给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工作者。爰为之序。

2014年8月31日于北京宜园

秦珪自述

新中国成立前接触进步思想

我1928年出生于山西太原，祖籍是徐沟县（新中国成立后和清源县合并为清徐县）大常村。我在太原上了几年小学。九一八事变后，太原也弥漫着反对日本侵略的气氛。我上小学的时候，《五月的鲜花》、《抗日进行曲》等歌曲都会唱，后来形势紧张了，1937年和母亲回到了徐沟县赵家堡我姥姥家。当时我父亲正在外地出差，七七事变后回不了太原，先是在上海，后来去了香港，直到1941年才辗转回到山西，也到了我姥姥家，抗日胜利后才又回到太原工作。赵家堡村离太原60多里，还隔一条河，太原沦陷后那里成了游击区，虽然鬼子有时也去骚扰，但八路军的游击队也频繁活动。八路军有一位王立刚同志常到赵家堡，给大家宣传抗日进步思想，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太原城工部的负责人之一。1945年上半年，我在太原上高中的时候，他介绍我和一个亲戚（也是同学）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太原市学生民主救国会”，还送我们一些小册子，封面是“文史通义”、“儒林外史”之类，打开一看却是《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还有续范亭写的《告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我们看过后，再传给可靠的同学，然后就藏起来了。

我1941年通过初试和复试，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因为家还

在农村，所以一直住校。抗日胜利后，阎锡山又恢复了他对山西的统治，还是和过去同样的腐败，同样的巧取豪夺，政治上思想禁锢。给我们中学派去的校长是个中将，训育主任也很有来头。有时候我们上课去，他就到宿舍来搜查，发现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就搜走了。我们就设法把一些书刊藏到他找不到的地方。我们的数学和物理老师是从大后方回来的，思想比较进步。数学老师王耀堂还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不仅数学讲得好，还经常在讲课时先用一点时间分析当时的形势，并且不点名地批判阎锡山的统治，大家非常爱听，对同学们很有影响。

194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燕京大学。由于过去看过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著作和《生活》杂志、《观察》杂志等刊物，受其影响，我选择了新闻系。燕大虽然是私立大学，但学校有奖学金、助学金，还有各种自助活动（现在叫做“勤工俭学”），我就参加自助商店和推磨花生酱的工作。燕大的地址就是现在北大的燕园，没有现在这么大，学生也不多，只有一千人左右，但地下党的组织和进步力量比较强。在解放战争期间和北大、清华一起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主力。燕大离清华比较近，“反饥饿、反迫害”、“抗议反动派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抗议非法殴打抓捕师大学生”、“保卫华北学联”等游行示威，燕大和清华都是统一行动，沿铁路步行通过西直门进城游行示威，集会则在当时北大红楼北侧的民主广场。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同时也受到了锻炼。1948年5月，我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52年“土改”回来后，参加了共产党。

当时的北平城是1949年1月解放的。1月31日解放军还举行了入城仪式。地处西北郊的清华和燕大却是在1948年12月就解放了。1948年12月13日我上午前两节课是体育课，就听到了北面的炮声，同学们都知道是解放军过来了。接着上经济学的课，炮声不断，讲课的赵靖老师说：以后我们的这个课大概就不能上了。当天下午没有上课，有些同学就坐校车进城了。枪炮声不断，而且越来越近，后来才知道，在离学校不太远的地方，双方的部队交火了。晚上国民党部队经过学校旁边的道路撤回城里，

学校的西、东、南三个大门都紧闭着。我们许多同学都在三个大门附近巡逻，防止有人打开大门，散兵进来骚扰。直到半夜才安静下来了。

第二天，即12月14日，校外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几个同学骑车向南，路上没有人，到现在的农科院附近，才看见已经是解放军站岗。他们摆了摆手，我们只好回学校了。12月15日，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刘道生同志来学校作报告，当时的贝公楼（现在燕园的办公楼）礼堂坐满了人，教职工和学生大部分都来了。刘道生讲了当时的形势和对大家的要求。同学们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是解放区了。

那时学校快放寒假了，大家都期待“和谈”成功，北平得以“和平解放”，也随解放军进城，帮助做些宣传工作。就在这时候，我不知什么原因，患了结核性胸膜炎，高烧不退，吴继文大夫检查后，说胸腔积水已经很多了，必须住院，而且要休学一年。于是我就住进了男校医院，过了一年的医院生活。

因为休学住医院，本来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也去不成了，外面的活动也不能参加了。我的高烧差不多一个月才退下来，胸腔的积液是保守疗法，我也记不清吃过些什么药了。胸膜炎刚好一点，又忽然得了阑尾炎，当时疼得直掉汗珠子，打了一针吗啡才止住，最后还是送到协和医院做了手术。校医院只有几间病房，病人也不多，只有两三个长期病人，一个是肺结核，一个是哮喘，我们都成了病友。开国大典我们去不了，病友老孟做的矿石收音机让我们听到了实况广播，效果还不错。

因为休学，在校医院住了将近一年，养病恢复期，还看了不少文艺书，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基度山恩仇记》等，还有过去未看过的中国的一些古典小说和武侠小说，如：《东周列国志》、《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这个机会倒是难得的。

我1950年复学，暑假火车通了，回太原和三年没有见面的父母亲住了一个多月。

燕园三进三出，与人民大学结缘

我在燕园的经历可以说是“三进三出”。

我1947年入学，1949年因为患胸膜炎休学，一年后才继续学习。在我要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1951年暑假，我们新闻系本来要实习的，正好毛主席1950年发了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我们就给水利部写信，说我们愿意暑假实习到治淮工地做一些宣传工作等等。后来水利部同意了，也给了经费，于是我们十几个同学就到了蚌埠治淮委员会，然后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工地润河集。我们都是自己带行李，和工人一样住工棚，和工人一起劳动，顺便进行采访，还出了几期石印的小报。当时还有一位新华社有经验的记者，给了我们不少帮助。水利部的副部长钱正英也去过那个工地，她鼓励我们，还和我们一起照过相。实习结束后，我们坐船回到蚌埠。当时正是半夜。我们就在河岸边靠着行李睡了一觉，天亮后到治淮委员会报到。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宣部宣传干部训练班，从1947年入学，到1952年毕业，这是我在燕园的“一进一出”。在宣传干部训练班里，有不少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新闻系毕业生，培训一年后再分配到新闻单位。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私立大学都停办了。遗憾的是1951年已经改为公立、毛主席还给题写了校名的燕京大学也被停办了。清华、燕大的文、理科都并入了北京大学。燕大新闻系成了北大中文系的编辑专业（后改称新闻专业）。北大原来没有新闻系，燕大新闻系留下的教师只有两三个人，人手不够，就把我从中宣部干训班又调回北大，也就是原来的燕园。后来中宣部从上海解放日报社把罗列同志调来，主持新闻专业的工作，专业逐渐发展到有二三十位教师的规模。新闻专业的办公室、教研室设在一个独立的两层小楼，即“新闻馆”，包括图书资料

室。但中文系的办公室、教研室却在文史楼内。

我当时是在新闻专业当助教，同时兼中文系的教学秘书、团总支书记。1953年党委还应民主党派的要求，让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九三学社”，做一些统战工作。由于做这些工作，我和游国恩、吴组缃、王瑶、季镇准等许多老教授都比较熟悉，好多次请他们给新闻专业的学生上课或开讲座，有的课我也跟着听。我还开玩笑说，上大学时老搞运动，没怎么念书，现在等于读了“双学位”了。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新闻专业，教学工作起初也是学习苏联，专业课程安排除了新闻史以外，业务课就是一门《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后来还是恢复到《新闻理论》、《新闻采访写作》、《报纸编辑》、《新闻评论》等好几门课程，教师也可以分工教学。我当助教，那几年只讲过半年《新闻学导论》。后来让我准备《新闻评论》课。

当时中宣部为了扩大学生的眼界，跟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打了招呼，要求这两个单位的领导给北大新闻专业的学生作报告。新闻专业为此开了一门课，叫《通讯社工作和广播工作》，联系工作都是我做。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副社长朱穆之、邓岗、石少华和黄操良，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温济泽、李林、黄云等都来讲过课。这两个单位自己都有车，用不着学校接送。我在校门口等着，然后给他们带路，到文史楼教室作报告。这门课很受欢迎，有些教师也来听报告。

这些领导同志都很认真。温济泽同志一次没有讲完，又讲了一次。他在讲课前就给了我一个讲授提纲，让我在他讲完后，再根据讲授内容整理成文稿。黄云同志是管广播技术的。他讲完课后，还带领听课的三四十位同学参观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技术部门。后来我们还请《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及胡绩伟、王若水，还有其他单位的负责人作过报告。邓拓是给全专业师生作的报告，他那谦逊文雅的作风和精彩的报告内容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们请当时的不少名人给学生讲课或作报告，如《工人日报》总编陈用文、《新观察》总编戈扬、作家王致远，影评家钟惦棐、贾霁，名

记者萧乾等，其中萧乾是燕大新闻系主任蒋荫恩的同学，钟惦棐是甘惜分老师的朋友。钟惦棐上午的报告没讲完，中午在甘老师宿舍休息，下午接着讲。他还带领学生看了一部外国电影《米兰的奇迹》，然后让学生写影评，后来居然有两篇发表了。“反右派”期间，有关部门还来学校检查学生听课的笔记，想找出些问题，结果也未能如愿。校外这些同志的报告，对于学生增加知识、开阔视野是很有好处的。这些报告和专题讲座大都是我去联系和组织的，当然也要跟着听课，有不少课我还作了笔记。对于我这个助教来说，也是受益匪浅。

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了人民大学新闻系，我也随系到了人民大学。从1952年调回北大，到1958年离开北大，去了人民大学，这是我在燕园的“二进二出”。

新闻专业从北大到人大，当时不少人还是有不同看法的，很多老师和同学都不太愿意并过去，因为他们觉得新闻系相关的知识面应该宽一点，在综合大学比较好一些，这方面北大是有优势的。而人大的专业领域有点狭窄。但当时罗列、孙觉等同志就认为，到人民大学，新闻是单独成系，而且人民大学是我们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比较受重视，这方面条件比较好。当时人大的校长是“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他搞过新闻宣传工作，也办过报纸，对新闻很重视，所以还是并过来了。当时我们带过来三个年级的学生，1959、1960届都各有三个班，这两届学生都在100人左右。1961届只有一个班，二三十人。他们都是北大入学、人大毕业。以后就在人大招生了，“文革”前入学的都改为五年制。到人大后，我记得吴玉章老校长还来参加新闻系的开学典礼。

当时的人大新闻系主任是安岗，他原来是从《人民日报》的副总编的岗位上过来的，当时也是个名记者，他给学生讲过《新闻学概论》和《新闻评论》课。我和另外一位青年教师胡文龙给他当助教，负责帮他找材料、备课，有时在他家里忙到深夜。后来《新闻评论》课他讲了三次课，三次课都讲得很好。三次课讲了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断”，就是写新闻评论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有论断；第二个字是

“战”，就是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肯定有跟你不一样的观点，所以要论争、论战；第三个字是“文”，就是不光要有正确的论断和论战，还要有文采，就是要讲究语言。这三次课很受欢迎，对我们影响都很大。

1969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去了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1971年提前从干校调回来了。然后我又到了北大，一直到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才又回到人民大学，这就是从燕园“三进三出”了。我在人民大学一直工作到1994年离休。

从“土改”到“文革”

1951年10月，我还在上大四的时候，我们到江西参加“土改”。我参加的这次“土改”工作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北京高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大部分都参加了。因为燕大、清华、辅仁的人比较少，所以这三个学校组成了一个团，叫“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中南区第十六团”。团长由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吴组缃教授担任，副团长是辅仁大学一位讲师。我们这个团分别在余江、东乡两个县开展工作。这次土改本来是要文科毕业班的师生参加的，燕大老师不多，而且忙于参加当时的“三反”运动，所以教师和学生中的党员都没有参加，结果就安排我担任秘书长。我当时不是党员，我到市里汇报准备工作的时候，市领导对此提出了批评。最后蔡次明等几个学生党员就参加了，还成立了党支部。副秘书长是清华的学生党员万邦儒，我们合作得很好。土改团的师生在北京集训了一段时间，然后到武汉，听了杜润生同志的报告，了解当时的形势和要求。我们这个团分配到江西，在南昌集训了一段时间，就分到了东乡、余江两个县。清华和燕大的师生分别在东乡的两个区，辅仁的师生在余江。我每一两个星期给团长写信汇报情况。由于没有电话，只能如此。工作队分成许多组，同学们分到各组，每个村一个组，组长都是从东北南下的干部，比较有经验。

“土改”的时候，要求工作队员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扎根串联等，各组同学基本上都能做到，当然也受到锻炼，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没收了地主、富农的财产给贫下中农分“胜利果实”的时候，包括家具、粮食等等，每个人都愿意多分一点，看见别人比他多了就眼红。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几天连着没怎么睡觉，就给这些贫下中农做工作。东乡县属于上饶地区，那时正好有个姓何的副专员来我们这里蹲点。他跟我们说：“现在是把土地这些东西分给他们，结果你们还搞得焦头烂额的，将来要学苏联集体农庄，还要把土地从农民手里再要回来，那时候才更困难！”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的这些话。后来迫不及待地搞农业合作化造成的后果证明了这一点。“土改”回来之后又搞了“忠诚老实”运动，在燕京大学专门搞了一个“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运动。由于这些运动，基本就没有正经上过长时间的课。

1958年我们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的时候，正赶上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当时新闻系、档案系、历史系还在城里办学，我记得一进“铁一号”（现在叫“张自忠路三号”）的校门，就看见楼前堆了一堆不知如何制造的“颗粒肥料”，也不知道能不能用。紧接着就开始“大炼钢铁”。当时人民大学按照军事编制，新闻系除了几个连，还成立了野战营，我们野战营的几个教师主要就是带学生在各地报社实习。我和张隆栋老师一起带着学生去山西太原，在《山西日报》实习。那时候我们新闻系有一些学生是“调干生”或带职带薪学习，实习的时候他就回原单位，另外还带几个学生去实习。我们这些带队的老师去了之后，学生实习，我们也跟着一块儿实习。我当时还带着学生一起去了太原钢铁公司采写报道。我跟一位编辑还合写过社论，内容都是和“大跃进”有关的。

1959年开始“反右倾”。学校和新闻系当然也会受到影响。有几位老同志也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被下放劳动。新闻系1960年还搞了一次所谓“学术批判”，可以说这是“反右倾”的继续。以批判修正主义为名，把一些正确的观点给否定了，把大家弄得无所适从。几本内部的教材也都受到了批判，并祸及某些骨干教师。中宣部知道这个情况后，派副部

长张盘石、新闻处长王谟、《人民日报》编委肖航等同志组成调查组进驻人民大学，学校也派副校长崔耀先和几位政治课教师协助工作。这次“学术讨论”对事不对人，主要是弄清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观点，提高思想认识，把那些错误的东西基本上纠正过来了，最后还写了一个总结报告。我参加了这个报告的讨论和写作，也受到了教育。

在这以后，教学工作就比较正规了。我负责讲授《新闻评论》课。当时的学生是五年制，64届的学生第九学期要学评论课，我结合给他们讲课，写出了一份较详细的讲稿，内容包括：“评论的特点和作用”、“立论”、“论述”、“论战”和“评论的文采”几个部分。为了学习方便，我和胡文龙同志还编了两本教材：《报刊评论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报刊评论选》。

64届学生毕业之前，1964年上半年，我还指导了七个学生的毕业论文，内容都是有关新闻评论的问题，如：“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是提高评论思想性和理论性的重要途径”、“学习毛主席政论的斗争艺术”、“试论毛主席评论中的形象性问题”、“学习瞿秋白同志的杂文”、“试论杂文的形象性”等。这些论文写得都很认真，有自己的见解。我记得七篇论文有六篇的成绩是“优”。

65、66届的学生都和我们一起参加了1964~1965年的“四清”运动。我都给这两个年级讲了《新闻评论》课。但由于赶上“文化大革命”，都没有写毕业论文，

后来的“四清”运动，人民大学派了三个团，山西一个团，陕西一个团，湖南还有一个团。当时孙泱副校长在新闻系蹲点，他带队到山西忻州地区搞“四清”。新闻系的师生在定襄县的宏道、平东社、北社西几个公社的一些村庄。我和部分师生在宏道公社的西社村。这个村子比较大，是革命先烈续范亭同志的老家，离宏道公社比较近。孙泱副校长和党委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就在这里蹲点。按理说忻州地区也是山西的产粮区，但当时百姓的生活还很苦，和所谓“糠菜半年粮”的情况差不多。好多人家都吃糠窝窝、高粱面窝窝，玉米面就算好东西。孩子哭闹，大人给他块玉米面

窝头就解决了，跟城里的孩子吃点心一样。我们当时是在老乡家里吃派饭。学校有个纪律，吃派饭不许挑好的吃。大家吃派饭的时候，老乡总是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端上来，但我们都是挑差的吃。后来，三个村子师生比较集中的，学校派炊事员来自己开伙，就好多了。我们这个工作队又分成了很多组，组长大多都是由教师担任，我当时也担任一个组的组长。孙泱同志很重视总结经验，每个阶段都总结。后来把我从组里调去专门写材料。回学校之后，还找我去写“四清”工作的总结。

1965年“四清”回来不久，1966年“文革”就爆发了。因为从北大到人大之后，我也没当什么“官”，只当过一段时间教研室副主任，所以没有受太大的冲击。这期间我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油印小报”，起了个名称叫“为人民服务战斗队”。当时有些人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毛主席尚未发表的文章，例如毛主席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就没有公开发表过。我们就到处找这类文章，找到了就把它印出来。我和几个同学一起编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小册子。这些文章牵涉到机密的问题，后来都勒令上交了。我们做这些事情，不用参加打派仗，等于当了“逍遥派”。

1969年11月，我们第一批去了江西余江“五七”干校。人大干校一共五个连，新闻系在三连，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基建队，由每个连派一个排组成，任务就是打石头。三连正好把我所在的那个排派去了。当时各连都住在农民的院子里。基建队就在打石场附近的一个大石坑，把积水用好多天抽掉，然后把石坑晒干，加上屋顶和一些小窗户，这就成了有名的“水晶宫”，一个大宿舍。基建队的一百多人都住在里面。虽然都有床，但也很拥挤，好处是离打石场近。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鼾声就奏起了“交响乐”。不过白天打石头很累，大家也就睡着了。

在干校打石头是重活儿，我们搞加工的整天要弯着腰。赣东北气候不好，春天雨多。只要是小雨还要干活，棉衣淋湿了，晚上烤干第二天照样干。我们基建队还打了个“703战役”，就是1970年3月一个月只有三四天没有下雨，但是还打了好多天石头。当然，雨大的时候就只好休息了。夏天天一亮就拿着锤子上打石场。到10点钟左右才洗脸吃早饭，有时候

干脆就不洗脸了。我本来就有腰肌劳损的毛病，老弯着腰干活当然毛病就加重了。在干校也无法治疗。以后若干年终于发展为腰椎间盘突出，离休后走路就比较困难了。我们在“水晶宫”住了大半年。我一开始不愿意挂蚊帐，拿布条蘸了“敌敌畏”挂在床头，但后来还是受不了了，蚊子实在太多，只好把蚊帐挂起来，我应该是“水晶宫”里最后几个挂蚊帐的。

致力于新闻人才培养

1971年年初，我和蓝鸿文提前调回了北京，其他系也有一些人调回来，有些人去了北京医学院和其他单位。我和蓝鸿文老师都被分到了北大。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挑的，可能因为我跟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同志比较熟悉，又在北大工作过。1970年9月，北大招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中文系在北京、天津、东北和63军的战士中共招了近二百人。1971年暑假后分为新闻和文学两个专业，大部分到了新闻专业。学校当时提出学生要学习六本书，掌握四种文体的写作。六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四种文体是小言论、大批判、通讯报道和调查报告。这些规定并不错，但没有认真、系统地组织学习。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次马、恩如何批判伯恩斯坦等的“修正主义”。后来我学习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觉得不仅内容好，而且写得也很精彩。我给一个排的同学着重从写作角度讲解，效果不错，很受欢迎，军宣队的人也来听。本来在一个大房间大家都坐着小马扎听，后来别的班的同学也挤过来听，三次才讲完。我们到北大后一开始也没确定工作任务，就先安排我们带着学生去实习。蓝鸿文带着学生去了《河北日报》，我带学生去了《北京日报》，一去就是四五个月。后来我们还多次带学生就近到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报社实习。1974年，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来一说工农兵学员，大家都觉得工农兵学员水平较差，我老为他们打抱不平。因为工农

兵学员一开始入学的时候，没有入学考试，都是地方上保送的。有的已经高中毕业了，有的在部队当了好几年新闻干事，水平也是不错的，当然也有的可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所以他们主要是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不是说所有的都差。分了专业以后，那时就我和蓝鸿文把北大新闻专业管起来了，他当党总支委员，管党的工作，我管教学行政。1973年人民大学的教职工都从干校回来后，新闻系的人大部分到了北大中文系。1974年的时候，在校宣传队安排下，又搞了一次“反右倾回潮”，全系批判我和蓝鸿文。因为那时候“开门办学”，别的系都去工厂、农村去劳动，我们带学生去报社、电台实习。因为到报社、电台后，也还要下到农村和工厂去体验生活或作调查，对学生来说实际上也是新闻实践。但这时就说我们只专不红，不抓阶级斗争。我和蓝鸿文晚上也不能回家，但学生还很同情我们，悄悄来跟我们说：“老师，别怕，没事儿！”后来也批不下去了，没等“文革”结束就给我们平反了。

1976年，我曾经带学生从河北日报社去唐山记者站，到沙石峪采访当时的劳动模范张贵顺，在那里住了几天。采访还没有完，学校又把我叫回来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是针对邓小平同志的）。唐山地震后，我们部分教师也和学生去抗震救灾，主要是帮助群众盖简易住房。我因为地震前后都去过唐山，更能了解唐山地震的惨状，几乎惊呆了。我们住过的地方也没有房子了。9月初去的，10月份回来，“四人帮”就垮台了。

人民大学复校以前，我们还参加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同年在一次邓小平参加的科学教育工作会议上决定的。参考人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而且寒假前就组织考试。录取的学生也打破惯例，春季入学。因为当时各个单位都缺人，需要输入新生力量，而有条件的学生又上不了学。当年全国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报载有570万人。新中国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终于打开了。高等教育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当时北大中文系几个专业在全国各招了一个班，新闻专业30人。为